万历援朝战争以后东北亚海洋秩序的重构

——胶辽沿海国家权力与防海军人之互动研究

刘 晶

【摘 要】伴随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明王朝对东北亚区域内的海洋秩序进行了重新构建,加强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联结,并将国家权力向北部滨海地带深入。这种情形促进了胶辽沿海海洋活动的重启,使之成为更具开放性、连通性与包容性的海上活动空间。这表现在该地区与朝鲜半岛交流的增加以及两地间一体化趋势的凸显,明王朝对该地区自然、社会资源的依赖与利用程度也有所提高。此种转变与明朝防海军人在当地的发展轨迹相互作用。一方面,明朝与朝鲜之间海洋防御与管理的推进有赖于这些基层力量的有效运作。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防海军人逐渐发展出超越国家权力边界的势力,他们的跨境流动与非法暴力使其从边海安全的维护者转而成为威胁者。

【关 键 词】万历援朝战争;海洋秩序;防海军人;东北亚;明朝

【作者简介】刘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国家航海》(沪),2023.30.72~91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中朝之间的海上交往与海域管理研究(2020ELS002)”项目资助。

前言

1592~1598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1537~1598年)两次入侵朝鲜,试图挑战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构建新的东亚政治秩序。由于万历皇帝出兵援助朝鲜,国内学界将此战称为万历援朝战争。胶辽沿海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地理位置接近,故而受到日本侵扰的直接威胁。[①]出于抵御日军与援助朝鲜的需要,明朝的国家力量开始在胶辽沿海持续地延展与深化,在巩固自身海防力量、开拓海洋管控范围的同时,也强化了该地区与朝鲜沿海间的军事联络,疏通了驶往朝鲜的海路。在此过程中,沿海防御与管理体系中的基层官兵得以流动在两国之间,活跃于陆海边界,在这一社会环境当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路径。在东北亚海洋秩序的重构中,国家权力的运行与基层防海军人的活动如何呈现?两者的互动态势又如何与万历援朝战争时期乃至17世纪初战争结束后胶辽沿海的变化趋势发生关联?

以往学者多在中国区域经济史或海防制度史的框架中探讨明代北部沿海的发展情形。前者侧重于揭示这一地区的内在特性,凸显其海洋经济的活力。学者注意到,明清时期该地区的开发日益活跃,区域内外的联系日渐紧密,但也认为明王朝以消极的治理机制遏制海上活动的发展。[②]后者主要探讨了北部地区的海防海运情况。对于万历援朝战争期间相关内容的考察,集中在中朝之间海运粮饷的实施过程,[③]明朝北部海防体系中出现的新变化等方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面。[④]这些研究或缺乏在超国界的东北亚海洋空间和具体的国际环境中理解王朝海洋治理机制的灵活性;或多从制度层面梳理明朝为维护北部海洋安全所采取的系列举措,对国家机制的运作如何影响胶辽沿海的变迁脉络未能进行说明。

防海军人群体构成了明朝海洋防御与管理体系的基础。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浙江籍军人在处理海防事宜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的活动状况与王朝意志作用下胶辽沿海的发展变化紧密交织,进而在这一国家权力所及的边缘地带与制度的运行之间形成张力。以往对这一时期北部防海军人的研究,主要置于南兵的抗倭功绩中进行。[⑤]其中,杨海英对义乌将士的个案分析尤为系统,将他们个人命运的走向嵌入明朝后期的政治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从微观视角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南兵群像。[⑥]除了对南兵在万历援朝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外,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后期征发南兵中产生的花费巨大、难以善后、兵士哗变和兵源质量下降等问题。[⑦]以上研究勾勒出南兵群体军事实力与政治生涯的盛衰,同时也论及这一过程所反映出的明朝财政危机、政治纷争与兵制变革,但并未探讨防海南兵的动态轨迹及其对东北亚海洋区域产生的持续影响。

基于此,笔者对万历援朝战争发生后明朝的国家权力如何推动胶辽沿海的变迁展开讨论。笔者认为,相较于明代早中期而言,明晚期的胶辽沿海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区域在海洋形势上发生积极转变,成为更具开放性、连通性与包容性的海上活动空间,具体表现为该地区与朝鲜沿海之间通过交流与联结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地区内自然与社会资源利用程度的明显提高。[⑧]此外,笔者还将进一步关注明朝防海军人——尤其是其中的浙江籍军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发展势力,并试图揭示他们如何在广阔的海洋空间中与有边际的国家权力之间产生复杂互动。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对万历援朝战争这一国际背景下东北亚地区海洋秩序的重塑过程及其衍生后果做出探讨。

一、向海通邻:国家权力主导下明代晚期胶辽沿海的形势转变

与元朝政府积极维护与充分利用黄渤海地区海路交通不同,[⑨]海上通道在很长时期内并非明王朝与朝鲜半岛间往来的首要选择。明初定都南京期间,高丽及朝鲜使者进入中国需要横渡黄海至长江口,或取道辽东后经由渤海海峡深入内地,但随着14世纪末辽东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以及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朝鲜使者开始固定从鸭绿江至山海关一线入贡。这条贡路便捷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与贸易活动,使其免遭海上风波之险,因此一直沿用到后金攻克沈阳、辽阳,阻塞辽东陆路交通为止。[⑩]

同时,15世纪初之后的胶辽沿海也缺乏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元、明之际,倭人曾大肆侵犯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辽海、山东地区尤其受到频繁滋扰。但是自从永乐十七年,明军在辽东金州卫的望海堝取得大捷以后,“倭寇不敢北侵”。[⑪]即使是在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沿海遭遇倭寇危机之时,北部海疆依旧相对晏然。1540~1566年间,在中国沿海一带共约267起倭寇入侵案例当中,只有8起发生在山东。[⑫]正因如此,明朝政府将海防重心放在东南一带,致使15世纪初以后的北部海防日益削弱,具体表现在沿海地区卫所缺伍、巡检司地位下降、城池荒废、战船减少等。[⑬]

16世纪末以前,除了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该区域内部的官方海上交通也逐渐停滞。明初,国家通过渤海海峡运输军饷物资至辽东卫所,但辽东屯田的成功施行,使得作为权宜之计的大规模辽东海运至永乐初期即已停止。[⑭]此后,尽管山东登州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运布花仍然持续,但明朝政府已尝试采用更为经济便利的陆运、折银等替代方案。同时,登辽海运的运行与管理过程也存在诸多问题。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登辽海运逐渐呈现颓势,并最终在正德初年完全停止。此后直至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万历援朝战争，登辽之间的海道只在荒歉之年偶尔重启，用以运输和贸易粮食，赈济辽东灾民。[15]

与登辽海运的废止相呼应的是明王朝在胶辽沿海实行的内向型海洋管理机制。16世纪初以后，朝廷在此地区域面临的一大治安难题是“登(州)、莱(州)岛民原系辽阳所徙，不受法制”。[16]由于担忧辽东海上逃人与倭寇沆瀣一气，明朝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这些非法移民进行约束、遣返或禁海，但成效较差。[17]万历二年(1574年)，辽东巡抚张学颜终于对日益严重的岛民暴力活动进行了弹压，并彻底禁止辽东与山东之间的私人海上交通，对民船的数量、规制等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只许其用于“搬运米薪、捕采鱼虾”。登州、金州军官还需各司其职，定期搜捕海上逃民。[18]每年“搜岛烧荒”这一规定至少在万历援朝战争发生前数年仍在执行。[19]

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些情形，极大地提高了黄渤海地区在促进跨境交通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明王朝对胶辽沿海的认知与管控方式开始转变。这一现象与明朝政府此前在该地区的经验积累不无关系。洪武时期，中国南北之间开展大规模海运，用以输送北征粮饷，乃至部署军队、抵御倭寇，至永乐年间方彻底废止。此后，尽管内河漕运取代海运成为水路运输的主要方式，但在弘治、嘉靖时期，仍有人提议重开海运，疏通北部海路航道。隆、万之际，为缓解漕运危机，明朝政府还曾短暂试行南北之间的直接海运，在建造雇募海船、组织运输等方面拥有宝贵经验。[20]如果说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对明晚期胶辽沿海的海洋转型产生了催化作用，那以上这些实践经验则为这一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历史土壤。

胶辽沿海海洋形势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点，以下试分别阐述之。

其一，明朝政府开始重视并利用胶辽沿海连通外部海域的属性，将此地区与朝鲜半岛一起视为国家海洋防御体系中相互依存与紧密结合的共同体。这一点极为清楚地体现在万历援朝战争初期负责防倭事宜的明朝中央官员宋应昌上呈给万历皇帝的海防地图《华夷沿海图》之中。[21]与强调中国沿海形势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海防图不同，《华夷沿海图》打破国家边界，将胶辽沿海及朝鲜半岛之情形并重，使二者各居一幅地图之中。二图合一则成《华夷沿海图》，在直观上突显出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宋应昌在《华夷沿海图序》中还解释了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如何为日本入侵中国提供便利条件。他指出，日本入寇朝鲜，是“审舆图，谙海势”的行为。朝鲜水路直通大海，因此日本占领朝鲜后，可经由“洛东、汉水、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舟四出，桡吾四镇”。[22]这种对中朝海洋形势的洞见使得宋应昌担任经略后，能够从整体的海防策略出发，注重对胶辽沿海防御的统筹部署以及在朝鲜门户庆尚、全罗两道的留兵驻守。[23]

中日议和失败后，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五年初再次发动对朝战争，被称为“丁酉再乱”。此时明王朝对胶辽沿海与朝鲜海域之间的连通性与整体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不仅视胶辽沿海为军事防御区，还重视其连接和支援前线战场的作用，以发挥北部海路交通在组织跨国物流与军事活动中的能动性。同年二月，大学士沈一贯和张位提出明朝应在开城、平壤二处“开府立镇，练兵屯田”，以便在朝鲜建立根本，长期应战。他们强调，“既定此策，即当通登、莱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兴，从此渡军，以讲水战，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由此“二镇联络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鲜之黄城岛，涉釜山而规对马”。[24]虽然在开城、平壤设镇的想法遭到朝鲜君臣的反对而未克实施，[25]但沈一贯与张位对于登辽海路的规划却得到重视。相比于陆路交通，开通这一海道可以更高效地运送粮饷和军队，在保障明军后勤的同时，又可以联络朝鲜要地，窥察对马岛情形，使明朝在战略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

同年八月，明军在南原之战中失利后，朝廷在作战方针上做出更为积极地调整，在胶辽沿海采取以战为守的策略，重视水军力量的动员和调遣。[26]沈一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贯继续阐发了上述思想，认为若只重防守而不总辖海道，则不易调动舟师，接应朝鲜，难得战守之利。他奏称，“(天)津(登)莱同是一海，不得分而为两，兵气宜扬不宜抑，战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而为两”，因此提议创设天津登莱巡抚以总理海务。[27]万历皇帝批准了这项建议，令推举熟练兵事者出任此职。[28]

其二，明朝的国家权力开始向胶辽滨海深入，并以包容与灵活的方式管理这一地带，由此加强了对当地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使用。宋应昌就任经略不久后即详查辽东、山东海上情形，建议将战前禁止居住和通行的庙岛群岛变为明朝在渤海上的军事藩篱。他认为这些岛屿的地理位置险要，军事价值不可小觑：

辽东旅顺口与山东蓬莱诸山对峙，相去五百余里，中有海岛一十七处，棋布星罗，彼此接望，诚天造地设，横亘其间，而凡登莱北海、天津东海、蓟门南海，胥赖此险为门户也。[29]

若能利用这一地利，在此处驻军防守，出海巡哨，则敌军不敢贸然前进。设若敌寇继续深入，则诸岛可与天津形成夹攻之势，可使其腹背受敌。此外，他还认为山东成山角与靖海卫附近诸岛可与庙岛群岛互为声援。

与此同时，明朝官员还重视开发近海岛屿与滨海荒地的经济价值。山东粮食在第一次援朝战争时即被大量召买，运至前线，其间又逢饥荒，仓储不足，因此万历二十二年，山东巡抚郑汝璧提议开垦登州以北土地肥饶的长山诸岛，以缓解当地的供粮压力。[30]为避免“以民佃居”的方式导致海上人群难以管束，他命令登州营卫军士“什伍而耕”，并对其居住地点、耕种与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以便在有效利用登州军士“且耕且防”的同时，防止他们在海上聚集久居。[31]次年正月至四月间，“已开过长山南北二城岛田二万二百二十五亩，系沃土，陆续播种，禾苗盛茂，可望有秋”。郑汝璧还估算，若其余娘娘庙、黑山、砣矶三岛“尽数耕种，获当十倍，诚海上之一大利也”。[32]

进入战争第二阶段后，滨海荒地的开垦范围进一步扩大，其耕种和管理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朝廷下令查勘山东未垦之地，尤其是其迤东海上抛荒地方，并多方招引民人承佃。为鼓励这些外来人口在当地长期耕种，还实行免租税、编户籍、分里甲、疏沟渠等政策。[33]二十五年十二月，为增加饷费，天津地区环海荒芜土地亦“示谕远近军民自备工本，尽力开种，官给印照，世为己业”，并且三年之内不准课税。[34]二十九年，该政策施行后，天津临海葛沽、白塘二处耕种田地五千余亩。[35]

对于山东、辽东之间的海上逃民，明朝政府的态度也逐渐转为接纳。从宋应昌的实地调查来看，战争开始之时，庙岛群岛的逃民已“筑室耕田，尽成家业”。他提出应当招抚并组织这些海上非法移民成为民兵，具体做法是“择其忠勇为人推信者，每岛一人，量给冠带，或名色把总，令其统率精壮者为兵”。他还提议调遣“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只，应天船兵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只，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岛”，令官兵与民兵共同协防。[36]但在战争初期，这一建议未获采纳。1597年南原之战后，明朝加强对水军的调发，对其倚仗程度也日益加深，并在北部沿海采取更为主动的战守结合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御史何尔健认为登辽岛民“慓悍可用，宜募为水兵”，于是再次提议将其纳入海防体系，终被兵部接受。[37]

以上论述表明，16世纪末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震荡，使得明王朝摒弃之前在胶辽沿海所采取的消极防卫与严厉海禁政策，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和开放的方式，逐步强化对这一地区的防御与管控。在此情形下，胶辽沿海与朝鲜之间的联络与交往程度加深，两地在军事与交通层面上连为一体。同时，胶辽近海岛屿与海上人群也被充分地开发利用。

二、互动交织：明朝防海军人在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的活动状况与势力发展

明朝中后期，浙江出身的南兵群体以战备精良、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善于作战、军纪严明而闻名，被全国各省招募征调的情况十分普遍。[38]万历援朝战争时期，南兵因作战能力卓越亦被大量调遣并参与海防事务。因北人不善舟楫，“水战宜用南兵”，北方地区的防海水兵尤以南兵为重。[39]上述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沿岸的形势变迁尤其有赖于南兵的努力，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利用当地资源建立声名、军功与关系网络，为其个人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沈一贯提出设立天津巡抚一职，数日后，山东右布政使万世德即被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海防。[40]万历皇帝敕谕万世德“管理天津、登莱、旅顺等处海务”，并命他不拘一格，广泛收用人才，招募兵丁，“诸凡文武罢闲将吏、布衣人等，但有奇谋善谍、奋勇立功者，俱得收用”。[41]浙江湖州人姜良栋就是在此情况下被万世德任用的。作为基层防海官兵中的一员，他积极行动于中朝之间，为稳定边境社会形势作出贡献。他在胶辽沿海的活动更是构成当地海洋治理模式变迁中的重要环节。而同时，他亦直接成为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将这一未被学界注意但却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事迹放在明朝防海军人在中朝边境的群体活动中进行考察，能够了解明末胶辽沿海的区域性海洋转型与基层军官的个人际遇之间如何相互影响。[42]

姜良栋是湖州府归安县(今浙江湖州)人，“少事铅椠，颇识训诂”，学业未成即弃去，补为本邑掾吏。因自感抱负无法施展，加之父母亡故，因此他服丧期满便仗剑从戎，离开故里。[43]姜氏好侠义、有辩才，又热衷于边事，故而入京后即受到万世德赏识，被举荐给刚担任大同巡抚的胡来贡。[44]其时因宣府、大同、山西三镇互市未定，胡来贡急需招徕人才处理相关事宜，遂以姜良栋为其标下通事。[45]之后，姜良栋于万历十三年考中武举。[46]他这一弃文从武的个人经历在明代后期的南兵群体中并非少数。据杨海英研究统计，万历援朝战争中义乌出身的东征朝鲜将领中，近90人大多有此经历，成为万历时期颇具时代特色的现象。[47]

根据当时兵部的叙功奏疏来看，万历十一年间，姜良栋在与蒙古各部的交涉中出力颇多。奏疏称“大同巡抚标下通官姜良栋等八十七员，出入虏穴，一身之艰险不避，讲译市事，中华之威令能伸”，还说他“以口舌代甲兵，以笔札为干橹，内严堤备，外示羁縻，终岁忧勤，功逾大捷”，称赞姜良栋以过人的口才协助互市顺利进行。[48]或因善于沟通，又具备处理边境事务的经验，万历十九年间，他又被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大山西军务的郑洛委以向导之任，联合洮州、河州、西宁诸处土官番族驻扎西宁，击破青海蒙古反叛诸部。[49]其时万世德为辽东兵备佥事，随郑洛行边，[50]姜良栋的这一任命或与万世德不无关系。朝廷分别嘉奖了姜良栋的两次功勋，赐予他冠带、银两。[51]但直到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他的事业才迎来真正转机。

1597～1598年万世德担任天津巡抚期间，姜良栋前往胶辽沿海处理海防事宜。这一调派自然与姜、万二人的私交有直接关系，但亦是从战争初期开始浙江兵士被集中招募调发至黄渤海地区投身海防事务的缩影。因此，笔者拟先对浙江军人的这一活动状况作阐述。

查检史籍，胶辽沿海征调浙江军人的案例甚多。例如，万历二十年六月，兵部覆题宝坻、丰润二处为蓟镇沿海适中地方，令游击吴惟忠领南兵在此驻扎。[52]九月，蓟镇督抚建议将新设立的海防游击驻于渤海北岸的乐亭县，统领南兵3000人，增募700人。[53]二十一年，莱州设立南兵营。因莱人不能操舟，故海上所设战舰“势不得不以南人领之矣”。[54]二十二年四月，因倭氛未靖，河间等卫精锐防边官军与守船南兵合3000人，驻扎于天津一带，并与陆营兵3000人互为犄角，以成水陆夹攻之势。[55]二十五年八月，蓟镇、永平、密云又新募南兵6000人。[56]

不仅如此，浙江军人也在朝鲜的沿海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92年底，李如松率领三路大军驰援朝鲜，其中有南兵11000人，他们在平壤之役中战功卓著。[57]中日议和期间，明军主力虽撤出朝鲜，但南兵将领吴惟忠、骆尚志仍率部众进驻南部沿海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庆州一线，与退据釜山地区的日军对峙，以致朝鲜称“本国支撑堤备者，唯独天兵是籍(借)耳”。[58]

战事再起之后，明王朝尤为重视利用浙江水兵参与中朝之间的军事行动，这导致浙江水兵在海上的活动范围逐渐拓展，其重要性也更为凸显。1598年正月，朝鲜经略邢玠命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周于德在旅顺调集统率水兵，相机策应，进可援助朝鲜，退可防守内地。同时，山东总兵李承勋带领舟师出汛长山岛，以守卫登莱门户，与旅顺互为应援。[59]此二人都出身浙江行伍，在东南地区曾有丰富的海防经验，足见16世纪末胶辽沿海在抗击倭寇的军事行动中对于浙江军人倚赖之深。[60]1598年中，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后，其余北方沿海要地，如鸭绿江近处、山海关以及山东的莱州、成山角和安东卫，也都增设水兵，其控制范围也相应从旅顺、登州近海扩大至中朝边界、辽东南部沿海、渤海湾与山东半岛。[61]同时，由于作战方略的改变，明朝水军被大量派往朝鲜，仅直接从浙江当地调用的水兵就有6400名。[62]在防海御倭副总兵陈璘的带领下，包括浙江水兵在内的2万明军水师与朝鲜联合击退日军，取得了露梁大捷。[63]

除在海上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明朝防海水兵介入海洋事务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其职权也有所扩大。例如，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监督、组织和护送东征粮饷的海上运输中。1598年正月，督饷户部右侍郎张养蒙提出，因到朝鲜半岛海道迂远，护送不便，弊端易生，“惟有僦运、防运合为一体，于势最便，于财最省，于事最得济也”。他建议将海防与海运系统相结合，在天津、登莱、旅顺乃至朝鲜沿海各处海防官军中破格任用专员，鳞次接管转饷事宜，“则官兵不添而自足，事权不分而自专，不惟海运无虞，因而熟知海道、演习水战，亦防海之大计也”。[64]在此基础上，中朝海运系统的武装化程度得以提高。汪应蛟就曾建议，为防止日军断绝东征粮道，沿海各道运船应配置铳炮刀枪等武器，管运官也“必以精强颇识水战者充之”，使“运艘皆为战舰，运卒皆为战兵”，“万一朝鲜更需水兵，亦足以长驱珍岛效一臂之助矣”。[65]

可以看出，16世纪末，明朝防海军人在黄渤海地区的积极活动使中朝两国间的军事联系更为紧密，海上交通得到保障，这与胶辽沿海区域性海洋转型的首要表现相互呼应。同时，也正是借由这一趋势，这一群体得以迅速发展自身的数量、活动空间与职权范围。

胶辽沿海地区发生转型的另一表现，亦即在进取性治理模式的影响下，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充分，这一点更是直接体现在姜良栋对海上事务的深度参与中。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万世德提议“海上渔盐船户及岛中亡命可充为兵者，俱得召募”。[66]十二月，他举荐姜良栋承担这一职责，招抚海上岛民，相度海势险夷。[67]万世德疏云：

照得臣分辖地方，南接淮、杨(扬)，东尽鸭绿，延袤几数千里。中间岛屿联络，自西而东，自东而北，自北而复西，自西而复北，始至旅顺。查得往时海运泊船之处，历历可指，中间平壤者，间有居民；险瘠者，多称要害。有居民则宜编保甲，称险要则当置守望。……查得臣标下效劳见委赍奏把总姜良栋，系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俶傥不群，慷慨自命，驭下则倾身结纳，虽金石而可靡；承委则矢志周旋，即汤火而不避。十年边塞，曾掉舌而折龙庭；千里沙场，又捐躯而扫鱼海。诚得若人而用之，必有成效。[68]

万世德认为应加强对天津、登莱、旅顺之间渤海海域的管理，对居住其中的岛民加以编户，险要之处进行防卫。他根据姜良栋在宣大、山西和青海处理夷务的成功经验，认为姜氏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因担心以姜良栋的通官身份无法制服犷野岛民与海上亡命，他还提议对姜氏“量加把总名色，使衔命而往，竖标而呼”。姜良栋的具体职责包括：

自淮、杨界起，自安东而至靖海，自靖海而至威海，自威海而至登州，自登州而至旅顺。中间各岛，有人住居者，或立耆民，或立保长，或优以冠带，或免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其差役。其有自备船只可资会哨，临海山阜可据传烽，俱议给行粮，务裨实用。其原无人住之处，是否可以泊船，是否可以瞭望，如果堪厄险，则议添哨船；果能望洋，则议增墩戍。一一亲历，处处调停，务使我之耳目外张，臂指内扞。[69]

兵部采纳万世德的建议，授予姜良栋浙江湖州守御千户所署所镇抚，量升署指挥佥事，令其充天津海务巡抚标下招抚海屿把总。[70]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万世德再次上奏，称把总姜良栋已赍带银牌、花红，并有船只、乡导及随行人役，前往登莱、旅顺等处招抚岛民。但从万世德所转引的姜良栋本人的调查报告来看，后者的实际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山东沿海一带，尚未涉及登辽之间以及旅顺的情况。据姜良栋称，他将青州府所属斋堂岛以及莱州府所属灵山岛和竹槎岛上的辽东居人编立保甲，并丈量岛上熟地，令每亩纳谷2升。经统计，三岛一共有76户，男妇289口，熟地473亩，渔船17只。他还充分发挥了这些岛民在海上的哨探和向导功能，不仅指示他们“万一有警，飞星传报”，还强调应利用他们熟识中朝之间海道的优势，“分作南兵乡导”，如此“则停湾进止，极为易便”。[71]

姜良栋的另一任务是勘察海上险要之处，部署战守机宜。他查得济南府地方有大清河、牡蛎嘴等紧要海口九处，另外，登州府地方有薛家、青黄等岛并海口三十四处，皆为冲要，可以泊船驻兵。他从自己“生长浙地，素谙海情”的背景以及此次“遍历岛屿，形势了然”的经验出发，指出南北方海上地理条件的显著差异，并根据自己对北部沿海的充分观察提出相应的海防策略，认为需在连通义州、鸭绿的辽东旅顺和突出海中、指向釜山的山东成山角加强防卫。[72]

姜良栋将非法移居的岛屿逃民转化为海防所需的军事助力，并详细调查了胶辽滨海的地理形势，反映了16世纪末明朝政府对此区域的关注度和管控能力都在加强。而姜良栋亦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经理海上事务的经验，并由此获得晋升资本，将个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至朝鲜。万历二十六年中，万世德转任朝鲜经略，因姜氏“慷慨不群，激昂自奋，波涛已试，锋镝堪摧”，奏请升其为守备，率领新募南兵600名奔赴战场。[73]姜良栋于十一月左右到达朝鲜，但未及加入实战，只留在朝鲜处理东征善后事宜。[74]御倭经略邢玠与万世德于此时又提议量加姜良栋游击职衔，“以隆责任，且示鼓舞”。[75]

在朝鲜期间，姜良栋在部众间以及朝鲜君臣中获得了一定声望。他约束远征官兵，严禁纵酒嫖赌、扰乱本地秩序，同时又对他们极尽体恤，为其寻医问药、收葬祭奠、请功加恩。[76]因此部下称他“视兵如子，甘苦必同，爱卒若身，险夷一致”，自愿捐俸200两，为他立石表名。[77]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姜良栋准备启程归国之时，朝鲜国王亦移咨万世德，称赞姜氏“律己以廉，御下以恩”，希望万世德可以对他“优加奖励，仍许暂留”。[78]虽然从朝鲜方面的记载来看，这封咨文是在姜良栋及其部下的暗示下写就的，其目的非欲领兵久留，而在于彰显己功，因此朝鲜官员沈喜寿评价姜氏有“轻躁自伐，唯恐人不及知之病”。但同时，沈喜寿亦称他“临事详密，不少放过，务令成就乃已，此实南人之有诚悃者也”，可见咨文所述并非不实。[79]

顺带一提，姜良栋晚期的军事职责仍与他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处理海务的经历密切相关。万历三十一年，苏州发生生员之变，姜良栋被升为应天巡抚曹时聘标下坐营游击，除需加强城内治安外，亦负责出洋哨探，严明海防。[80]大概也是因为这一擢升，其祖父姜鈜、父亲姜潮皆被赠以骠骑将军、南京中府都督佥事。[81]可以看到，短短数年间，姜良栋从地位微末的通官晋升为守卫一方安宁的游击将军，其个人事业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依托于16世纪末明朝对胶辽沿海的开拓性经略。他的个人案例以及同时期防海兵士的群体活动皆表明，随着明朝国家对这一地区防御范围的扩大和管控程度的加深，防海军人得以广泛、频繁和直接地参与到中朝海洋事务中去，由此熟悉当地地理条件，获取军事经验和政治资本，并掌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握可供利用的装备、资源与航海条件。

三、挑战治理:防海军人的非法暴力与跨境流动

16世纪末,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与联结明显增强,区域整合的趋势逐渐明朗,明朝政府对于胶辽沿海的管控也变得更加积极与灵活。很大程度上,这些转变应该归功于明朝防海军人在黄渤海地区的种种活动。但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权力有所扩张,跨境流动亦被合法化,由此发展起来的个人势力与国家的海疆治理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张力。对于明朝官方而言,本应保卫沿海地区的防海军人转而成为边海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以至于战后数年,辽东巡按熊廷弼对于海防问题发出"往时中国之难,难在海上之亡命,而近日之难,难在防海之官军"的感叹。[82]

学者已指出这种现象和明末募兵素质的普遍下降有关。[83]尤其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兵变致使东征回还的南兵被屠戮减员,再加上战争再度爆发后驰援朝鲜的明军数量激增,因此招募标准有所降低,兵员已不如首次赴朝时训练有素,纪律严整。[84]而随着16世纪末明朝缘海备倭的需求增强,防海军人的招募范围亦有所扩大,以致"所招蜑户、岛人、渔丁、贾竖,以至无赖恶少之辈,皆得衣食于县官"。[85]这些人群本就流动性极强,不易受到法制约束与官方控制,被吸纳进海防体系中之后又利用合法身份在海上往来,成为中朝两国边境秩序中不稳定的因素。

防海军人的遣散与善后中出现的饷银拖欠等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因此而激发的军士鼓噪在战争初期即已显现。例如,万历二十年九月,浙江巡抚提议令"熟于海务"的坐营都司吴天赏,"才俱可用"的把总韩光、张良相率领船兵赴天津听候调遣。[86]但次年六月,吴天赏率领的"征倭归兵"就因"赏犒不至"而发生哗变。[87]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张辅之以为"此辈非市井游徒,即草泽亡命",而主将吴天赏不仅无法及时约束他们,还有克扣粮银之嫌,因此以"克银酿乱"之罪参劾吴氏。[88]1595年,登州南兵因裁撤问题发生哗变,"群拥道衢,露刃狂詈",而主将备倭副总兵杨文"被论实挑激之"。[89]杨文最终因"贪暴"被革职,昭示着此次裁撤亦存在经济方面的冲突。[90]

战后,天津、登莱、旅顺的防海官兵更是被大规模裁撤。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天津巡抚即建议登莱、旅顺二处水兵各简三千。[91]万历三十四年四月,又裁撤天津海防副将,改设游击一员统领水陆兵二千五百,这样每年可减省廪饩兵饷马料银四千余两。[92]同年十一月,又撤旅顺游击,改设守备一员,同时汰去官兵六百二十名、饷三千七百六十两。[93]被撤的旅顺浙兵随即在登州鼓噪,或许也是因为遣散费用没有得到妥善解决。[94]

在朝鲜留驻的明朝水兵也被冠以贪婪之名,成为对当地社会"极其扰害"的存在。[95]上述因为才可堪用和吴天赏一起北上御倭的张良相,在朝鲜却得到了相当负面的评价。张良相在日本军队撤离后与另一水兵将领贾祥驻防朝鲜,然二人差官"来来去去,项背相望,或称虎豹皮求请,或称花席贸易,或称逃兵缉捕,或称丧车护送,或称火器输运,虽其差官名号不同,皆是侵征无状之辈",深为朝鲜君臣所不喜。[96]在巨济、南海之间留兵善后的水兵游击李天常亦被朝鲜人称为是"为人孔邪,贪虐无耻","[97]"所谓贪婪一路作弊者也"。[98]这些现象固然是明军纪律下滑的表现,但也和战后朝鲜社会凋敝以及明朝财政危机带来的水兵粮饷供应匮乏有很大关系。[99]

除此之外,16世纪末以后东北亚海洋经济的发展是理解防海军队对明朝海洋管理冲击的另一重要维度。御倭援朝期间,国家许可、鼓励并组织跨境运输与贸易,中国东部沿海的私船、粮商得以参与其中,向朝鲜战场输送军饷,长期以来被禁锢的私人越洋活动得到发展。[100]官方与私人力量在海上的交错致使一些沿海军人利用职务之便谋求自身利益,和运粮民人之间形成互惠关系。朝鲜刑曹正郎黄汝一在接收山东海运而来的粮饷时,曾生动描述过这样的情形:山东舟人在运粮途中以次充好,为使粮食颗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粒变得大而有光泽，利用海水浸泡粮食，然后迅速风干，致使船舱中堆积的粮食外表无恙而内部腐烂。虽然朝鲜人将此事报告给督运粮饷的委官，但“所谓委官者，不过曰千百户、旗舍官等，其用心反甚于舟子，无意说经于牛耳”。他们“计舟而受赠”，和运粮民人相互勾连，对朝鲜的指控置之不理。[101]

战争结束后，两国间的海上运输随即停止，沿海居民亦被严禁下海往来、互通消息，“毋容一船一人往来停泊，致有奸人通倭起衅”。[102]但活跃的私人海上贸易并未因此中断，防海官军甚至还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辽东金州地区还出现“愚民山野，十勾九抗，奸商违禁，私自下海，贩卖私货，夹带逃军，而武官不遵明禁，贪肆无怠，莫敢谁何”的现象。这清楚表明，由于金州沿海官军的纵容，海禁政策无法严格施行，以致商人、逃兵纷纷下海参与走私。因此，辽东巡抚赵楫在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提出在金州设置海防同知，其职责就包括“稽查往来奸商船只”，使“悍野官民赖以弹压、水兵海禁俱有责成”。[103]

但根据万历后期先后担任登州知府、登莱巡抚的陶朗先所见，这一举措并未起到明廷所期待的禁海效用。相反，陶朗先指出，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山东通过海道转运粮饷，又“许商人由海贸易”，海上交通与商贸已有所开展。而“至万历三十年间，又从巡抚辽东都御史赵之请，添设辽东海防同知，而商旅乃为之大通”。这之后，防海军人的海上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至万历三十七年，在登州驻守的山东防海副总兵、浙江山阴人吴有孚甚至在中朝之间建立起海上走私贸易网络，“以兵船兴贩私货”。[104]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17世纪之初的黄海海域呈现出相当不平静的态势，短短数年间，朝鲜西海岸就接连发生中国防海军人的越境事件。据笔者所见，即有万历三十年十一月旅顺把总徐上龙等人遇风漂至忠清道，[105]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旅顺地方将官标下浙江籍军人胡惟忠等人至黄海道，[106]以及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原籍浙江军兵在朝鲜海岸的搁浅事件。[107]这些案件都有违例下海、不同寻常之处。在第一例案件中，徐上龙等人赍带“山东旅顺海防游击金秉钺牌文一纸，内有仰本官即便带领捕盗毛勤等沙唬船只，前往黄骨弥川一带汛地等字样”，说明他们的任务是巡防汛地。在朝鲜，他们亦供称自己为下海巡哨。但辽东都司随后了解到他们实际是为了“前往登州府，请支本年冬季分钱粮”，其下海目的和上峰指示有所不同。[108]第二例案例的性质更为复杂，涉案的防海军人胡惟忠等形迹颇为可疑。他们虽持有公文以证明其官军身份，却有追赶朝鲜盐船、携带朝鲜物件等类似海盗船只的行为。[109]在第三例案件中，原籍浙江的军人船只更是“自外洋来，扬旗鸣金，追赶丽船，不意落浅”，船上还有“铳炮、刀笼、鸟枪、火药诸器，与青蓝布匹、杂色货物”，具有明显的武装走私特征。[110]于是，辽东巡按熊廷弼于1609年提出更为严格的约束防海官军在海上巡防的范围和时长，令其“不得越扰异国，引惹番衅，以时出哨，大汛小汛各照限准，不得经年在外，长为贼盗，并通行直、浙、闽、广沿海地方，一体遵行”。[111]

即使是无法明确定义越海人身份的案件，其暴力化程度也大为增强，以致朝鲜人有“海贼出没于西海者，近来益甚”的说法。[112]黄海道黄州牧使甚至报告称：“近年以来，水贼横行，海边之民，船只被掠者，无岁无之，人皆含愤之，日久矣。”[113]从《事大文轨》中的一则文书来看，仅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至三十五年闰六月间，朝鲜平安、黄海、忠清、全罗各道军民就发生七起和“贼船”的冲突事件。这些船只载有中国人的衣服和文书，其中两起案件中，“贼船”向朝鲜船只鸣金放炮，还有一起案件中有“贼船四只，带领军众约六百余名”，对四只朝鲜运米船“尽行抢夺”。[114]由此可见，在朝鲜西岸劫掠的海盗团体具有疑似中国人的身份，随船配备火器，并具有相当的组织性，这显然与16世纪末东北亚海洋地区军事化程度的提高不无关系。为此，朝鲜政府于1609年在黄海道白翎岛设镇；又于1611年在平安道登山串设镇戍军，与白翎镇相互声援；1614年还考虑将白翎镇佥使升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水使，以提高海防规格。这些举措无不反映出17世纪初频发的越海侵袭事件对东北亚海洋秩序的严峻挑战。[115]

结论

为应对16世纪末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明朝政府改变对胶辽沿海地区的既有认知与治理方式，加强其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一体化，并将原先滨海疆域的抛荒地带与非法人群纳入国家有效管辖的范围之内。与明初之后朝廷在这一地区所实行的相对消极的海洋政策相比，这些变动极富进取性，展现出在万历援朝战争这一东亚跨国战争的推动之下，明末国家权力在北方海洋空间的积极拓展。

在此作用下，胶辽沿海出现区域性海洋转型的趋势，与朝鲜沿海之间展开活跃的人员流动、物资运输与贸易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黄渤海地区的连通性特质并非明晚期的特有现象。倘若考虑到元代及明初期中国北部大规模海上运输事业的发展，乃至唐朝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由官方主导或许可的外交、贸易及运输往来，那么明代晚期胶辽沿海的区域性海洋转型既可以说是对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的一次突破，也可以说是对明初期以前该地区交流连通传统的一次恢复。

万历援朝战争以后，胶辽沿海海上活动的发展与明王朝对海洋安全的维护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而又复杂交织的景象：明朝国家以加强海防、支援朝鲜为目的所进行的海洋活动，反过来又增加自身海疆管理的难度。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防海军人在胶辽沿海的发展轨迹密不可分。明代中期海禁背景下，东南沿海以私商、海寇为主体开展海外交往。在其中，卫所军户利用自己“靠近国家制度的优势”，在国家权力的缝隙中开展制度之外的走私贸易。[116]与东南沿海军户参与跨海活动的初始路径不同，胶辽沿海与朝鲜之间的海上互动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进行，防海军人群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合乎法规而又至关重要。他们的重要职责是确保海疆安全，亦即加强对“此处”的管控，同时防御并驱逐来自“彼界”的可疑者与入侵势力。然而，万历援朝战争的发生使明王朝对海洋安全的维持变为一项“跨境”事务。其结果是，包括从浙江招募调遣而来的海防军人被大量派至黄渤海地区，广泛参与中朝之间的海上活动，并借此扩大影响，发展势力，乃至谋取私利。

万历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明朝的国家权力在东北亚海洋地区有所收缩，对海疆治理的需求重新回到战前的严防边境、禁止交通上，不仅裁撤遣散北方部分海防职官和部队，还断绝与朝鲜之间的海路运输，并重新实施海禁。这与战争中胶辽沿海开始凸显的区域性海洋转型有所矛盾，也和伴随这一趋势扩张势力的防海军人群体发生冲突。防海军人非法暴力的增加，越境事件的频发，和海上走私网络的形成，正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尽管明末胶辽沿海的管理机制伴随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在与后金(清)的军事对峙过程中，明王朝延续并发展其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具有进取性的海洋经略意识，进一步促进了17世纪上半叶黄渤海地区的连通整合与沿岸资源的调配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具有连续性的海洋治理机制为明末北方海上军事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例如，杨海英就曾指出，浙江山阴吴氏家族利用东征与朝鲜建立海上贸易关系，并在明清易代之际继续在辽东、登州、皮岛发展势力。[117]而东征时期明朝的海上活动、1618年明政府施行海运济辽，以及1621年重启中朝海路贡道等活动，更是为毛文龙、孔有德等皮岛将领发展海上贸易和军事活动提供了条件，促使其形成对明王朝而言具有离心力的政治势力。[118]

此外，如岸本美绪、岩井茂树等人注意到的，晚明的边境贸易热潮与商业—军事集团的兴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119]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明朝国家权力在万历援朝战争以后向边境地区的迅速拓展正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从万历援朝战争到明清鼎革时期，东北亚地区所持续进行的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域性海洋转型，虽是明王朝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重构海洋秩序的一种反映，其后果却恰与这一初衷相背离。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胶辽沿海地区包括从胶东半岛至辽东半岛之间的沿海地带及近海岛屿。“黄渤海地区”的空间概念与之相关，在此也一并说明。文章使用“黄渤海地区”指代包括胶辽沿海与朝鲜沿海地带在内的、两者之间的海洋地区。使用这一概念时，笔者侧重于说明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联系与海洋地区的一体性。文章有时也会用“东北亚海洋地区”代替“黄渤海地区”，强调从跨国史的角度出发，在东北亚区域中对相关议题进行思考。

②杨强：《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其他相关研究参见张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齐鲁书社，2005年，等等。

③参见[韩]洪性鸠：《丁酉再乱时期明朝的粮饷海运》，《新亚学报》第34卷，2017年8月；杨海英：《明代万历援朝战争及后续的海运和海路》，《历史档案》2020年第1期；刘晓东：《“山东粮”与明代抗倭援朝》，《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董建民：《壬辰御倭战争后期(1597～1598)明军粮饷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等。

④比如，赵树国指出，16世纪末中国北部沿海的军事实力和协调调度能力有所加强，“成为一个有机的海防战略整体”，见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张金奎强调“北方沿海常备水军的出现，是明代海防的一个重大变化”，见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59页；赵红认为，万历援朝战争时期山东海防有所增强，这与山东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促进，见赵红：《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发展——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为背景》，《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⑤参见杨海英、任幸芳：《朝鲜王朝军队中的中国训练师》，《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杨海英：《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军事历史》2016年第1期；孙卫国：《李如松之东征及其后裔流寓朝鲜考》，《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纪效新书〉与朝鲜王朝军制改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Tonio Andrade, Hyeok Hweon Kang, and Kirsten Cooper,"A Korean Military Revolution: Parallel Military Innovations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5, No.1(2014), pp.51－84; 김종수：훈련도감 설치 및 운영의 동아시아적 특성，장서각, 33(2015), 26－58; 박현규：임진왜란 명義烏軍출신張海濱과 한국浙江張氏고찰，이순신연구논총, 24(2015), 1－28.

⑥杨海英：《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⑦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明史学会，2010年，第118～135页；韩佳岐：《明朝后期对南兵的征发》，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牛传彪：《明中后期“浙兵半天下”现象考释》，《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

⑧从秦汉至明初，胶辽沿海地区，尤其是山东半岛的海洋性特质已较为显著。明代早中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全面实施，胶辽沿海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有所减弱。有关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史，参见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中华书局，2010年。

⑨元代中国在黄渤海沿岸地区组织海运漕粮，辽阳行省的金州、锦州港与平江刘家港之间，以及辽东半岛沿岸与朝鲜西侧之间都有运输航线。参见丛佩远：《中国东北史(修订版)》第3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83～187页。

⑩陈尚胜：《明朝初期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2～268页。有关明朝与朝鲜的水路贡道研究，另可参见[韩]林基中：《17世纪的水路〈燕行录〉与登州》，《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57页；孙卫国：《朝鲜入明贡道考》，《韩国学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文集(第十七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5~38页。

⑪《辽东志》卷三《兵食》,《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401页。

⑫马光:《明初山东倭寇与沿海卫所制度考论》,《国家航海(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⑬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239~247页。

⑭张士尊:《论明初辽东海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5期。

⑮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文史》2010年第1辑;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9~336页。

⑯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七,"山东事宜",中华书局,2007年,第457页。

⑰有关政策可参见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二《辽东镇》,"经略考",《中华文史丛书》第15册,华文书局,1968年,第149~151页;《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七,《汪司马太函集》卷一,"辽东善后事宜疏",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9~3620页。

⑱《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心斋奏议》卷一,"逋民尽数归顺疏",第3909~3911页。

⑲顾养谦:《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卷六《全镇图说》,"海道",《续修四库全书》第4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⑳相关研究参见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日根、陶仁义:《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㉑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被派往保定、蓟州、辽东等处经略防倭事宜,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乙巳,"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本,第4681页。《华夷沿海图》收录于宋应昌纂写并刊刻的《经略复国要编》中,见《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28~29页。对宋应昌《华夷沿海图》的研究,参见刘晶:《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东北亚地区地理知识的获取、传递与呈现:以〈华夷沿海图〉为中心的考察》,《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

㉒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图序",《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第27页。

㉓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362~369页。

㉔沈一贯:《敬事草》卷二,"经理朝鲜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3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1页。

㉕[朝]柳成龙:《西压集》卷三,"陈本国开府经理便否奏文",《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63~66页。

㉖陈尚胜:《论丁酉战争爆发后的明军战略与南原之战》,《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

㉗沈一贯:《敬事草》卷二,"请设天津登莱巡抚疏",第46页。

㉘《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第5867~5870页。

㉙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经略复国要编》卷三,"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第207~208页。

㉚刘晓东:《"山东粮"与明代抗倭援朝》,《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第326~331页。

㉛郑汝璧:《由庚堂集》卷二四,"条议防海六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6册,第632~633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九,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壬午,第5157页。

㉜《由庚堂集》卷二六,"录开岛田效劳官员疏",第664~665页。

㉝《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八,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庚子,第5923页。

㉞《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七,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丁巳,第5903页。

㉟汪应蛟:《抚畿奏疏》卷八,"海滨屯田试有成效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0册,第505页。

㊱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三,"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第207~208页。

㊲《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五,万历二十五年十月辛酉,第5882页。

㊳参见辛德勇:《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㊴参见冯琦:《宗伯集》卷二六,"东省防倭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39~340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㊵《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第5867~5870页;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戌,第5871页。

㊶姜良栋:《东征录》上,卷首"皇帝敕谕",第1a页,《镇吴录》第3册。

㊷姜良栋其人其事在中国和朝鲜史料中都只有零星记载,和以往为人所知的南兵将领相比寂寂无闻。但他编著的《镇吴录》却收录大量相关奏疏、公文与诗作,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勾勒出姜良栋的军事生涯。《镇吴录》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万历年间刊本,笔者所据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所藏内阁文库藏本之影印本。《镇吴录》内阁文库本装订为五册,根据内容来看,册目次序前后颠倒。第一、二册题名《镇吴录》,共有《镇吴录》(奏疏、条议、条陈、诗文)四卷,收录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姜良栋驻扎苏州期间的各类相关文书,以及地方缙绅、属下官员为姜良栋所作的诗文等;第三、四册题名《东征录》,分为《东征录》上下二卷,主要收录万世德及其他一些明朝官员的奏疏,内容有关于姜良栋在万历援朝战争时的活动,以及对姜良栋的任命、叙功、提拔。《东征录》中还包含姜良栋在朝鲜时所作揭帖、祝文,以及朝鲜君臣的咨文、诗作等;第五册题名《西征录》,为《西征录》一卷,收录万历十一年至二十年间有关姜良栋戍守宣大、宁夏的叙功奏疏。据姜氏自述,有感于万世德等人的知遇之恩,他还著有《知遇录》一卷,"图诸公小像,各叙甄拔颠末,以识不忘云"(《东征录》卷首姜良栋跋文),但未录于内阁文库本《镇吴录》中,亦不见于他处。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载,姜氏有《东征录》七卷,《防海策略》一卷,参见宗源瀚等修,陆心源等纂:《湖州府志》卷五七《艺文略四》,同治十三年(1874年)爱山书院刻本,第37页。七卷本《东征录》或为上述内阁文库本五册《镇吴录》(共七卷),而《防海策略》今则未见。后文提到,《东征录》收入的万世德奏疏对姜良栋上呈的沿海形势与防海建议有所引用,或许这部分内容正是姜良栋《防海策略》中的一部分。

㊸姜良栋:《东征录》上,"跋",第1a页。

㊹胡来贡担任大同巡抚的时间是万历十年(1582年)十一月,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三〇,万历十年十一月壬戌,第2420页。

㊺姜良栋:《镇吴录》第2册,"诗文",第40页。

㊻李堂:《湖州府志》卷三二,"举人表",第69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

㊼杨海英:《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军事历史》2016年第1期。

㊽姜良栋:《西征录》,"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兵部覆叙互市功疏略二",第9b~10b页,《镇吴录》第5册。

㊾姜良栋:《西征录》,"万历十九年八月经略题分布青海兵马疏略五",第32b~33a页。

㊿《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六,万历十八年八月癸酉,第4199页。

(51)姜良栋:《西征录》,"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兵部覆叙互市功疏略一",第7b页;"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兵部覆叙互市功疏略二",第11b页;"万历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兵部覆经略事竣大叙功疏略七",第46a页。

(52)《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九,万历二十年六月乙巳,第4639页。

(53)《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二,万历二十年九月丙戌,第4702页。

(54)《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1939年赵琪永厚堂刊本。

(55)《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五,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壬午,第5090页。

(56)《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三,万历二十五年八月辛酉,第5854页。

(57)孙卫国:《李如松之东征及其后裔流寓朝鲜考》,第82页。

(58)《朝鲜宣祖实录》卷四六,宣祖二十六年(1593年)十二月戊寅,国史编纂委员会,1957年,第22册,第198页。

(59)《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八,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乙未,第5915~5916页。

(60)周于德,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二年由浙江参将升为潮漳副总兵。参见齐翀:《南澳志》卷四《职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本,第3a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〇,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庚申,第5013页。李承勋,世袭浙江处州卫指挥同知,嘉靖及万历初年即已开始训练军兵,参与浙江海防。参见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卷一七四《人物四·武功》,乾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元年重修本,《中国省志汇编之二》,京华书局,1967年,第2917页。

⑹汪应蛟:《海防奏疏》,“倭氛未减防御宜周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5~398页。

⑹《朝鲜宣祖实录》卷九八,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三月甲寅,第23册,第406页。据浙江巡抚刘元霖《抚浙奏疏》记录,丁酉再乱时期从浙江调用的水兵有6354人,与《朝鲜宣祖实录》的记载基本吻合。参见郑洁西:《十六世纪末的东亚局势——以海外孤本〈抚浙奏疏〉为中心》,《浙东文化研究(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

⑹孙卫国:《明抗倭援朝水师统帅陈璘与露梁海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⑹《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七,《张毅敏集》卷一,“春运僮领防护要务疏”,第4668~4670页。

⑹汪应蛟:《海防奏疏》,“倭氛未减防御宜周疏”,第400~401页。

⑹《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六,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第5900页。

⑹上文提到,同年十月,兵部就采纳何尔健收募登辽岛民为水兵的提议,而早在战争初期,宋应昌已提出过类似建议。明廷对此意见的逐步接纳与实施,正表明其海洋管理政策的积极转向。

⑹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海防巡抚题招抚把总疏二”,第1~2页。

⑹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海防巡抚题招抚把总疏二”,第1~3页。

⑺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兵部覆招抚把总疏三”,第5a页。

⑺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海防巡抚题招抚事竣疏四”,第5b~7a页。

⑺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海防巡抚题招抚事竣疏四”,第6a,7a~8a页。

⑺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海防巡抚题改守备疏五”,第12b~13b页。

⑺《朝鲜宣祖实录》卷一〇六,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戊申,第67册,第17页。《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七年五月经理抚院题加游击善后疏略九”,第75a页,《镇吴录》第4册。

⑺《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五,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壬戌,第6212页。又参见姜良栋:《东征录》上,“万历二十七年五月经理抚院题加游击善后疏略九”,第75b页。

⑺姜良栋:《东征录》下,第1a~7a页,第10b~12b页,《镇吴录》第4册。

⑺姜良栋:《东征录》下,“万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本营目兵王大齐、楼文达、陈子龙、余化龙等呈词”,第7a~9a页。

⑺姜良栋:《东征录》下,“朝鲜国王李昖咨万都爷保留咨文”,第9a~10a页。

⑺《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七,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九月甲寅,第23册,第676页。

⑻《镇吴录》第1册,卷首“皇帝敕谕”;“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应天巡抚按会题叙举劾疏略”,第13b~16a页。姜良栋的后续情况及其所涉及的政治纷争因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在此只作简要叙述。1605年,周孔教替代曹时聘成为新的应天巡抚。正在此时,姜良栋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根据姜良栋的说法,由于他疾恶如仇,屡次与同僚发生争执,因此称病乞归。之后周孔教上疏,请求朝廷将姜良栋改调边方。参见周孔教:《江南疏稿》卷五,“调补坐营将领疏”,收于《周中丞疏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96~298页。兵科给事中孙善继则称,他听说周姜二人不合,姜良栋“奉职无状”,周孔教“预行论斥”,而姜良栋“假以条陈,历数抚臣行事乖张,具揭投院”,以此要挟周孔教,事情才终于平息。孙善继认为风闻未必不实,应准许姜良栋回籍养病,“不宜改调边方要地,以误封疆”。与姜良栋同时不再予以任用的还有南兵将领吴惟忠、蓝芳威。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五,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丁丑,第7791页。

⑻李昱修,陆心源纂:《光绪归安县志》卷三〇,“恩赐录”,光绪八年(1882年)刊本,第3b页。

⑻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1册,第437页。

⑻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募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㉞参见韩佳岐:《明朝后期对南兵的征发》,第50~54页。

㉟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37页。

㊱《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二,万历二十年九月癸酉,第4695页。

㊲《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一,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己亥,第4844页。

㊳张辅之:《太仆奏议》卷一,“将贪兵悍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2册,第428~430页。

㊴施闰章:《登州府志》卷一〇《兵事》,顺治十七年(1660年)刻本,第4a页。

㊵《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六,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乙丑,第5310页。

㊶《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二,万历二十七年三月甲申,第6140页。

㊷《明神宗实录》卷四二〇,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丙寅,第7961页。

㊸《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七,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壬午,第8057页。

㊹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第358页。

㊺《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〇,宣祖三十二年三月乙未,第23册,第590页。

㊻《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三六,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四月庚寅,第24册,第236页。

㊼《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八,宣祖三十二年十月戊寅,第23册,第685页。

㊽《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二,宣祖三十二年闰四月甲申,第23册,第608页。

㊾明朝政府在万历援朝战争及其善后阶段支出了2000万两白银以上,在战争第二阶段就已开始面临财政危机,参见万明:《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1599年战争结束后,留在朝鲜战场上的明军遭遇十分严重的饷银拖欠,“各兵自春夏以来,即缺月饷”,而水兵“尚有上年十二月未领者”,钱粮尤其缺乏,参见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九,“催发东征行月钱银疏”,《御倭史料汇编》第5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66页。同时,张良相、李天常、贾祥等人的水兵部队在朝鲜当地筹措粮饷时亦遇到极大困难,参见《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一二,宣祖三十二年闰四月甲申,第23册,第608页;卷一一六,宣祖三十二年八月甲辰,第23册,第671页;卷一三一,宣祖三十三年十一月戊申,第24册,第146页。

㊿宋应昌担任经略时已开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海运通道,在山东、辽东沿海召买粮食,雇募粮船,并运往朝鲜,参见《经略复国要编》卷二,“移山东抚院咨”,第147~148页;卷三,“檄海盖道”,第226~227页。战争第二阶段,海运发展成为两国间运输粮饷的主要方式,明朝政府在建造运粮海船的同时,还广泛募集辽东、淮安、山东乃至吴淞、浙江等处商船、渔船,参见邢玠:《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募造海船以济挽运疏”,《御倭史料汇编》第4册,第95~101页。

(101)黄汝一:《海月集》卷六,“上西厓柳相国书”,《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第87页。

(102)《经略御倭奏议》卷九,“春汛分布海防疏”,《御倭史料汇编》第5册,第386页。

(103)《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辛卯,第7134页。

(104)陶朗先:“登辽原非异域议”,见施闰章:《登州府志》卷一九《艺文上》,顺治十七年(1660年)刻本,第15b~25b页。有关吴有孚及其族人镇江游击吴宗道的海上走私案以及相关的中朝交涉,见刘晶:《水军、海盗与跨境贸易:17世纪初期的中朝海域交涉研究》,《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1期。对吴宗道、吴有孚案所反映的家族网络与政治生态的分析,见杨海英:《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0~173页。

(105)《事大文轨》卷四五,“朝鲜国王咨辽东都指挥使司(查报发还漂海官丁咨)”,《朝鲜史料丛刊》第7册,1935年影印本,第1a~2b页。

(106)[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卷一七《边圉典故》,“荒唐船”,《古典国译丛书》第11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年,第745页。《朝鲜宣祖实录》卷二〇五,宣祖三十九年十一月己卯,第25册,第285页。

(107)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39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⑩⑧《事大文轨》卷四五，“礼部咨朝鲜国王(礼部发还漂海官丁咨)”第31b～33a页。陈波认为，徐上龙案对1606年旅顺游击的裁撤有直接影响，见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第72页。

⑩⑨有关胡惟忠案的具体分析，参见刘晶：《水军、海盗与跨境贸易：17世纪初期的中朝海域交涉研究》，《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⑪⑩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39页。

⑪⑪熊廷弼：《按辽疏稿》卷一，“重海防疏”，第440页。

⑪⑫《朝鲜宣祖实录》卷一七八，宣祖三十七年九月丙寅，第24册，第664页。

⑪⑬《朝鲜宣祖实录》卷二〇七，宣祖四十年一月癸未，第25册，第303页。

⑪⑭《事大文轨》卷四八，“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3b～68a页。

⑪⑮《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卷五，光海元年正月丁未，第26册，第262页；卷一六，光海三年十月丙戌，第27册，第245页；卷二八，光海六年五月癸酉，第28册，第236页。

⑪⑯ 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01-129.

⑪⑰杨海英：《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⑪⑱从这一维度进行的研究有赵世瑜：《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Christopher S. Agnew, "Migrants and Mutineers: The Rebellion of Kong Youd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52, No. 3(2009), pp. 505-541.

⑪⑲参见[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日]岩井茂树：《朝贡·海禁·贸易——近世东亚的贸易和秩序》(《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0年。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ime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during and after the Imjin War: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the Sea Defense Forces in the Shandong-Liaodong Coastal Region

Liu Jing

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Imjin War(1592-1598), Ming China reconstructed the maritime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astlines of Shandong and Liaodong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State power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into the northern littoral. This situation promoted the maritime orientation of the Shandong-Liaodong coastline, making the region a more-open, connective, and inclusive maritime space. The Ming depended upon its coastal garrisons to enhance maritime defense and manage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Chosŏn Korea. It was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that they developed individual power beyond state control and soon emerged as a threat to border security.

Key words: Imjin War; Maritime Order; Coastal Garrisons; Northeast Asia; Ming China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